

中國古陶瓷學研究的雙關

——懷念耿寶昌先生

姜舜源

七日談

(北京篇)

故宮博物院是中國古陶瓷學術研究的聖地。這裏除了有兩漢魏晉隋唐瓷器，特別是宋元明清完整體系的官窯瓷器收藏，總量達三十五萬件，還有孫瀛洲—耿寶昌、陳萬里—馮先銘，分別代表的傳統經驗瓷器鑒定研究和現代考古科學鑒定研究最高成就的雙關，共同撐起中國古陶瓷學術殿堂。馮先銘先生繼陳萬里之後，運用考古學方法對古窯址進行發掘調查，文獻記錄、出土器物、傳世瓷器三者相互校證，從而斷定瓷器的時代及窯口，開創了古陶瓷研究新天地，把中國古陶瓷研究學術話語權拉回國內。馮先生於一九九三年，以七十二歲「壯年早逝」，如今耿先生也以一百零三周歲的高壽辭世，不禁使人倍感惆悵。

上世紀三十年代，耿寶昌進入享譽京城的文物行「敦華齋」，拜古陶瓷鑒定家、「宣德大王」孫瀛洲為師，抗戰勝利的一九四五年，年僅二十三的他已是業界後起之秀，在琉璃廠開辦了「振華齋」文物店，寓意振興中華。一九五六年，在中央政府文化部文物局局長王冶秋、故宮博物院院長吳仲超邀請下，師徒二人相繼加入故宮博物院，先後為國家搶救回來的瓷器等各類文物難計其數。一生經手過目的歷代瓷器上百萬件。國內絕大部分博物館一、二級瓷器藏品，都經他鑒定過；國外收藏的中國古瓷器，很多也經過他鑒定。耿寶昌總結古陶瓷鑒定要領和評判標準，創立了「造型、紋飾、胎釉、款識」四位一體的鑒定體系，簡稱「型紋釉款」，就像中醫診病「望聞問切」一

樣，被古陶瓷鑒藏界奉為四字真言。他於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明清瓷器鑒定》，輯錄幾十年來過目的明清各代官宦瓷器，全書六十餘萬言、近六萬幅圖片，是第一部系統闡述明清瓷器鑒別方法的專著，被譽為「二十世紀中國文物鑒定的里程碑」、「中國古陶瓷收藏界的聖經」。以傳統經驗鑒定著稱的他，還熱衷於古陶瓷學術研究，積極促進國家文物局主持、馮先銘主編的《中國陶瓷》的修訂完善；對科學考古寄予厚望，相信隨科技、研究、資料更新，陶瓷鑒定研究會獲得新發展；一九八六年，他和馮先銘受文物局指派，參加在荷蘭海牙舉行的南海沉船打撈文物拍賣會，深受觸動，回國後報請上級機關最終經國務院批准，於一九八七年成立了國家水下考古隊。馮先生去世後，耿先生對我說：以前兩人經常一起出差，遇到問題有個商量，現在真不習慣。

我於一九八三年畢業分配到故宮博物院時，耿先生已經六十一歲，在院內健在的國內外知名的十幾位大專家中屬於壯年。他給我深刻印象是「簡」。就是《尚書》舜帝「教胥子（教育貴族子弟）」，「簡而無傲」、「簡而廉」那個簡：為人不要擺譜，處事方正、自律。那時他上下班總是騎一輛二八大槓自行車（車輪直徑二十八英寸），不知為什麼特別高，因此感到他人也很高。當時實行福利分房。一九八四年春，院裏有一批房屋要分給職工，我是分房委員會秘書。耿先生家只有一間半平房，委員們建議給他一套樓房，將原住平

房交出來。耿先生回饋意見：不要新房啦，現住琉璃廠附近，孩子在北師大附中上學方便。幾年後，文物局認為他住房條件太差，將一位司機分新房後，騰出的西四大拐棒胡同一套舊房分給他。直到一九九二年故宮又大批分房時，才又給他補了一小間。耿先生對此毫不為意。

耿先生從學徒做起，成長之路歷經艱辛，但他對年輕人大大提攜，希望他們順利成長，因此深受年輕人愛戴。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鑒於不少專家年事漸高，院裏便成立了研究室，將專家們集中到研究室，提供比較好一些的生活和工作條件，以便整理昇華一生的學術成果。耿先生在承擔文物庫房工作的保管部陶瓷

組，幾次謝絕院領導美意，說那裏的年輕人離不了他，他也不願意離開他們。就這樣，他一直留在保管部（後來改組為古器物部）。九十年代台灣同胞興起一股收藏熱，楊新副院長和我先後幾次陪同他們赴西藏、承德、山西、內蒙古等地考察文物古蹟，每次在京逗留，耿先生都與他們餐敘，學說藏語「突幾其」（謝謝）、「扎西德勒」（吉祥如意）。

一九九一年，故宮博物院為激勵學術研究，第一次進行優秀論文評選活動。當時規定參賽者不當評委，耿先生顯然放棄了參評機會，而甘為他人特別是年輕人做嫁衣。當時我還沒有職稱，但成為五位三等獎之一。前輩學人的高風亮節、不拘一格，令我終身難忘。

一九九九年，他和楊伯達、楊新應邀到香港鑒定文物，大家又相逢。二〇一一年，我從香港回到國家博物館工作，後來在故宮見到耿先生，他已九十大多，想起《禮記·檀弓》孔子晚年，學生子貢稱「哲人其萎」，原來是說人老了個頭縮水。如今德高望重的耿先生走完「期頤」（百歲）人生，用《論語》子貢所說「其生也榮，其死也哀」，應不為過吧！



▲清乾隆黃地青花纏枝花紋轉心瓶。故宮博物院藏

◀耿寶昌著《明清瓷器鑒定》，故宮博物院紫禁城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一版第一次印刷本。作者供圖

深秋的北京

立冬前一大早已抵達首都機場，久違了這座美麗的城市。一下機便直奔市區開會，乍看氣溫已在十攝氏度左右，但人卻不覺寒冷。

下午，放下工作在建國門外大街附近閒蕩，途經光華路、永安里一帶，深秋的京城，銀杏處處，遍地黃葉。像筆者這種匆匆忙忙的趕路人，兩三天來來去去，獨自逗留一個城市，偶爾停下來，在午後驕陽擁抱下，看着黃葉飄飄，任由路旁小店拿鐵暖心。此刻，惱人的工作，煩心的俗務，都恍似煙消雲散，隨着落葉飄走了。我心依舊，不亢不卑，不疾不除。面對這眼前的一切無怨無悔，義無反顧……

晚上，既然來到了首都，北方的朋友邀請，每次都是盛情難卻。有時一大班新知舊雨滿堂歡聚，有時三兩老友小酌幾杯。沒想到這次自己趕上了全年度最大的一次世紀大月亮，十五月亮十六圓。幾位久別重逢的老友，坐在酒店八十樓的餐廳裏，倒也能清晰見到圓圓的大月亮。瞿總，一位金融才俊，他問大家，是否覺得大月亮其實也很幸福，因為世人總將團圓、圓夢、圓滿的事情與它結合在一起；Eileen，一位專業女律師，她卻不以為然，她覺得月亮是寂寞的，永遠都只有它一個，它的光也是來自於太陽……筆者喝下兩口威士忌，只好笑着說，不管它是幸福還是寂

寞，起碼今晚我們是幸運的，美景美酒當前，良友良夜歡聚嘛！大家都笑着稱是。

翌日，還是一個會議接一個，終於又到了晚上。筆者選擇獨自在長安大街上騎騎車，散散步。記憶又把我拉回了上世紀七十年代末的北京，那個屬於仲安與恩嘉的故事。他們在北京曾一起度過一段美好的時光，也是深秋，也是長安街，他們帶着小兒子來首都短住，大兒子則留在上海。眼前的長安街，筆者彷彿看見他倆騎着自行車就在我後面，車鈴噹叮，輕輕的話語，淺淺的笑聲……人或許可以回到從前，在平行時空裏，時間與空間永不需被定義定格。

想着想着已快到天安門廣場了，放好自行車，信步而行。晚上的廣場燈火通明，人還真不少。天安門城樓兩邊亮着燈影的噴水池，水柱有規律地舞動着，吸引了不少手持小國旗的朋友在此留影。再往前走，整個宏偉壯觀的天安門城樓已然安靜地出現在筆者的正前方，凝視着它總有一種說不出的力量。轉身背後便是聳立在廣場中央位置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它日夜守護着城樓。每次來京，這就是筆者必然會去的地方。

北京，雖不常來，但一年還是要來幾趟，工作、祭祖或旅遊。這座城市穩健與深沉，或許你不易察覺到它的蛻變與突破，但它從沒停止更新與進步。這就是北京，吸引着全世界各地的遊人同筆者，來此「古城」走走，走出屬於自己的新征程。



維港看雲 郭一鳴

上周末到珠海出席比賽活動，不是全運會比賽，而是由北師香港浸會大學主辦的第十屆中國數據新聞大賽和論壇。我孤陋寡聞，之前對這項大賽了解不多，但老友黃教授邀請，加上對「數據新聞」頗感興趣，遂欣然赴會。那天全運會自行車比賽經過港珠澳大橋，可惜我無緣一睹參賽健兒的風采，但在大會上頗有收穫。

北師香港浸會大學以前叫北京師範大學—香港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簡稱UIC，這是內地第一家與香港共同創辦的大學，今年剛好是建校二十周年。儀式開始播放創校初期筆路藍縷的短片，當年主事者的遠見卓識，令人敬佩。UIC創辦不久，我曾應邀到學校和剛入學的新生對話，我們的對話是晚上在校園廣場露天舉行，抬頭可以仰望星空，可惜忘了當時對話的內容。後來也曾到UIC出席校際學生創業方案評獎活動。再後來學校搬到新校址，繼而二期校園動工，改名北師香港浸會大學。全新的校園，全新的人事，全新的感覺。

「數據新聞學」（Data Journalism）在上世紀八十年代興起，與微軟視窗問世和個人電腦的普及有很大關係。二十多年前我在報館工作，同時在某學院新聞系兼

職教一門課叫做「深度報道」，當時還未有ChatGPT和DeepSeek，只有Google，我要求學生交功課時，寫明使用了多少次Google搜索。深度報道其實就是數據新聞一種形式。

據大會派發的資料介紹，中國數據新聞大賽於二〇一五年創辦，是一項全國性大型賽事，被譽為「中國新聞傳播教育轉型的方向標」。內地新聞教育對AI技術的應用十分重視，各地新聞機構更是全面步入融媒體時代，AI和大數據的應用非常成熟。幾個月前筆者隨香港新聞界訪問團到烏魯木齊《新疆日報》交流，該報播放一輯介紹新疆人文及自然風光的短片：天山、雄鷹、帕米爾高原、千年冰川、一望無垠的大草原、各族老少男女載歌載舞……每一個鏡頭都令人如臨其境、每一個畫面都令人深受感動。短片播放完畢，該報主管告訴我們，這不是紀錄片，而是AI的作品。

大賽和論壇開幕儀式在一期校園大學會堂舉行，我和來自全國多所大學逾三百名參賽同學分享個人的媒體實戰體會。毫無疑問，AI和大數據為新聞傳播注入澎湃生機，無論做新聞，還是做評論或主持人，都離不開數據。但我也提醒這些未來的記者和編輯，生成式AI對新聞行業的公信力已經帶來一定的負面影響，新聞倫理面臨挑戰，從而引起廣泛的關注，一度引人矚目的電視台採用虛擬主持人的做法未

能成為風氣，是其中一個例子。另一方面，今天大多數人特別是年輕一代主要透過不同的社交平台獲取資訊，而社交平台聘請大批工程師運用AI和大數據來推送資訊，卻沒有聘請專業的記者。新聞和大眾傳播學專業的大學生畢業後出路在哪兒？

近日網上流傳美國路易斯維爾（University of Louisville）大學電腦科學教授亞姆波爾斯基博士（Dr. Roman Yampolskiy）的驚人預測：在短短五年內，百分之九十九的工作將被AI和機器人取代。五年很快就到，預言是否成真，大家不妨拭目以待。京東老闆劉強東揚言京東九成的快遞員會被機器人替代，但我不認為機器人可以完全取代記者的工作。數據資料固然會說話，但挖掘、分析、過濾數據還是要靠人。AI機器人不能代替記者採訪，因為記者現場採訪的感受是機器人不能生成的。我相信，即使亞姆波爾斯基的預言成真，五年後社會上仍然需要記者這個職業。無論世界如何變、科技如何發展，真實是新聞的生命，新聞記者報道事實和追求真相，這一點不會變。

稍感遺憾的是，當天未能參加大賽的評審，匆匆趕回香港。但我相信，從一千四百多份參賽作品中脫穎而出，進入決賽階段的三百多件作品，一定精彩紛呈。十年耕耘，中國數據新聞教育早已碩果纍纍，未來可期。

外國人留學中國小史

漢」為立國口號，可見當時匈奴留學習漢俗的影響。

外國留學生大批入華求學是在唐朝。當時中國商業發達國勢強大，西亞阿拉伯地區和中亞、南亞跟中國經商，而且政治互動頻繁，有眾多使節和商人長駐唐都。入鄉隨俗，他們當然要來學習中華政治經濟和風俗人情。除了絲綢之路留學人員，同屬中華文化圈的鄰國來華留學也非常踴躍。比較著名的有日本派遣大量「遣唐使」，他們回國對日本文明進步有大貢獻，也有人在中國入仕甚至成為《全唐詩》收錄作品的詩人。除了日本，當年還有朝鮮留學生，那時叫新羅國，如較有名的崔致遠，十二歲來華學習十六年並在揚州做官，回朝鮮後擔任要職，為中朝文化交流作了貢獻。同樣，大食（古阿拉伯）、安南（古越南）、緬甸、尼泊爾等國亦遣人來華留學。除國家「公派」，還有私人留學的，當年唐朝政府對國外留學人員有優惠和獎學金，甚至給留學生特權，專門設置「賓貢進士」提拔外國人，發放「綠卡」允許他們在中國經商、考試、做官。留學生們來去自由，對傳播華夏文化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宋代對外國留學生也非常重視，專門建立了「蕃學」制度，為久居中國的外國人後代和國外來華留學生服務。據南宋趙

汝適《諸蕃志》記載，有五十多個國家的商人先後同宋朝有過貿易往來。宋時對外國人在華教育也是非常重視的。除了教育外國人，在藏區、吐蕃、克項等少數民族地區也普遍建立官辦蕃學。

元朝統治者征服華夏後曾歧視漢人，卻更樂於交往外國人。此期大量西域、高麗、日本和其他外國人入華。據文獻載元朝與亞、非、歐三大洲各國建立了多種聯繫，文化交流的範圍空前擴大。史載歐洲天主教曾以「十字教」名義傳入中土，促進了當時中歐文化間的互動和語言、習俗上的互相學習，促成了民間留學的種種實績。這一時期比較有名的例子有馬可·波羅來華等。

明清兩朝也跟海外交往頻繁，來華學習者眾多，從官方到民間大量輸入留學人員。明代留學生主要來自日本、琉球、暹羅、高麗、占城（今越南境）等國，清代來華不僅有亞洲等地的留學生，後期俄國也陸續派來留學生。

進入近現代，說到「留學」似乎成了去東洋和去歐美的代名詞。其實，中國在古代曾經是世界文明的策源地和制高點，是世界各國留學受教育的首選地之一。在研究中西文明交流史和世界教育發展史時，我們不可數典忘祖，忽略了這個基本的事實。



文化什錦 海龍

當長時間裏引領世界發展潮流，在政治、經濟、科技和藝術等方面都是高峰，而且跟國外有着長期交流。早在先秦時期就有絲綢之路，中土向國外輸出物質文明、思想和文藝等。雖然那時候大中華文明先進，但並沒有刻意輸出文化，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自然吸引了外國留學者。

據載歷史上最外族裔到中土留學的是漢明帝時代的匈奴人。《後漢書·儒林列傳》記錄漢明帝博覽群書很有才華，經常在京師開講座給儒生答疑解惑，聲震華夏。漢明帝也興建學校為功臣子弟施行教育，這些舉措傳到國外，吸引了周邊國家前來留學的興趣。史載「匈奴遣伊秩訾王大車且渠來入就學」，來者是南匈奴王子，漢明帝安排他在洛陽太學讀書，是中國歷史上最早有記錄的留學生。其後又吸引了更多匈奴人留學，有些匈奴人甚至改漢姓、穿漢服、說漢語。著名的例子有西晉末年的匈奴胡人劉淵竟然以「光復大



冬日「毛衣樹」

近日，隨着氣溫下降，北京國際關係學院為校園內的部分梧桐樹穿上「毛衣」，吸引師生打卡拍照。

中新社

市井萬象